

会员专供 注意保存

风景工作参考

主办单位：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总第226期)

本 期 要 目

- 景区“降价令”落地满百日 牵出旅企五大困惑
- 玻璃栈道亟需纳入国家监管范畴
- 青海湖景区禁止游客进入核心
- 景点跨界开发文创如何把控安全关
- 用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公园建设
- 修复吴哥：一场跨越26年的30国抢救行动（上）
- 美国政府关门重创国家公园

2019年1月31日

(所载内容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目 录

热点关注

景区“降价令”落地满百日 牵出旅企五大困惑	-----3
玻璃栈道亟需纳入国家监管范畴	-----11

新闻摘要

青海湖景区禁止游客进入核心区	-----16
海南设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17

社会纵横

景点跨界开发文创如何把控安全关	-----17
-----------------	---------

时事评论

用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公园建设	-----20
---------------	---------

世界遗产

修复吴哥：一场跨越26年的30国抢救行动（上）	-----21
-------------------------	---------

环球博览

美国政府关门重创国家公园	-----27
马耳他海边的自然石拱坍塌近两年，设计师想用钢铁多面体弥补它	-----29
印尼政府投巨资支持开发民宿业	-----31

景区“降价令”落地满百日 牵出旅企五大困惑

【证券时报2019年1月16日】玉龙雪山的秋冬是大风季节。能不能登上海拔4680米的山峰欣赏冰川，要看当天的天气能否允许索道正常运行。但比起气候，对以玉龙雪山索道为盈利主体的丽江旅游来说，对业绩影响更大、更难预测的是：自去年9月接到“降价令”后，玉龙雪山大索道票价降逾三成，接下来，原票价里上交给地方政府的环保资金交还是不交？如果交的话，交多少？

从2018年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去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印发具体降价意见，被外界称为“降价令”。截至去年9月底，共29个省份981个景区门票价格下降或取消，部分景区索道、游船、环保车等政府定价的交通工具定价也有所下调。

旅游是“诗和远方”结合的支柱产业。记者多地调研发现，若以去年“十一”为界，新政百日来，部分国有景区降价提质，推动全域旅游、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已经显现。

但正因为本次景区价格调整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意义，在具体调整实施的过程中，既出现了部分景区“降价不力”的问题，也浮现出操作上的实际困难。而在降价预期之下，一些景区管理中“权责不清”、“规定不明”的老问题也开始逐步激化，引发连锁反应。

“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一家景区上市公司董事长向记者吐露心声：降价是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同时也倒逼企业去厘清和政府、景区管委会、控股股东方面的“权、责、利”关系，这些更是痛点所在。

中国社科院1月份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仍有四成5A景区、八成4A景区门票没有降价。山东出台政策明确要“实现国有景区票价降50%”。亦有包括张家界副总裁金鑫在内等多位旅游行业人士疾呼：期待地方政府和景区主管部门在坚持降价的同时优化决策，平衡公共资源和产业运营的实际成本，统筹考虑中小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票价为什么难降？应该怎么降？降了以后相关方面怎么办？这些疑问在景区转型期更加明显。正如行业资深专家、前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高舜礼所叹：有些“热点”，实是“焦点”、“难点”、“重点”。

降价缘何“超预期”

寒风中，记者大概花了近1小时排队乘坐玉龙雪山大索道上行。索道工作人员说，去年云南进行了史上最严的“零负团”整治，团队游客数量骤减，叠加调价因素，整体比前几年少，但客流逐渐恢复。云南其他景区也莫不如是。

丽江旅游是全国第一也是目前唯一被下调索道票价的公司。在去年景区降价的浪潮中，玉龙雪山大索道双程票价从180元/人次降为120元/人次，降幅33%。结合2018年半年度业绩看，这三条索道收入占丽江旅游六成营业收入，是公司的利润基础。

从去年9月21日起，对“索道降价是否合理”和票价中“环保资金”的追问“刷屏”了丽江旅游的投资者互动平台。在风口浪尖中，公司仅表示，索道本身属于政府定价范围，“公司向省、市相关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多次申请、报告，说明公司情况，恳请维持原票价不变”。

和已经确定的索道票价下调相比，投资者更关心悬而未决的环保资金。丽江旅游表示，若新票价取消环保资金，丽江旅游2018年度索道收入减少约1200万元；2019年度索道收入减少约8000万元。若新票价继续缴纳环保资金，预计2018年减少索道收入2200万元，2019年索道收入减少1.2亿元。

减掉的都是真金白银。三个多月仍不能确定降价后环保资金存废的丽江旅游，折射景区类上市公司困境——这些公司高度依附于其所经营的垄断性旅游资源，但又带着公众公司独立自主市场化运作、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天然属性。

丽江旅游董秘杨宁婉拒了记者的进一步采访。他仅表示有关环保资金的征收问题，目前沟通未有进展。

除了黄山旅游、峨眉山门票降价外，桂林旅游宣布游船价格下调约20%。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一直实行门票和交通费“一票制”，环保客运业务也相应受到降价影响。

中央定调降价，执行要看地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上海财经大学教

授何建民等专家的看法是：除门票外，部分景区出现索道、客运等“超预期”降价，是各地政府对景区降价的范围和幅度要求的力度不同。

困难短期是存在的。金鑫坦言，降价以后环保车出现了票价与运营成本“倒挂”的情况。目前公司正在向相关部门争取车票和门票解除绑定，对车票重新核价。

降价“听证”行不行

同样含有索道业务的某上市公司财务总监Z先生告诉记者，今年7月，该省物价部门调研景区门票成本的同时，也向公司问及了索道成本情况，后期降价并未涉及索道。他非常关心丽江旅游的索道降价进展，认为带有风向标的意味。

最近被业内视为另一个“风向标”的是：山东省发改委去年底明确，“确保2019年底前，实现全省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在2018年1月1日的基础上总体降幅达到50%”。

“坚决把虚高的价格降下来”，山东发展全域旅游的决心和毅力可见一斑。但如何在坚持公益导向的情况下，科学、有序和公开透明地定出新的价格，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挤掉”原来票价中的水分，却有相当的难度。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票价到底定多少合适，应该做一番调查研究和测算经营成本。”高舜礼认为，在全国、起码是全省，应该统一有一套章法。

多家上市公司向记者表示，公司只是陆续收到调价通知，本身并没有话语权，并不清楚具体降价的执行，甚至出现了公司部分业务短期内“亏本”的情况。

“一开始，各省的态度是观望和互相参照。”有业内人士举例，去年8月为响应降价，某省物价部门第一次讨论出的门票降价方案降幅较小，方案被省政府“打回来了”，在参考其他省份10%-30%不等的降价情况后，9月物价局将门票降价幅度划定在了15%左右，方案终获过关。

此前国家发改委政策明确，景区门票要履行定价成本监查或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做出价格决策。外地游客为主的景区，可通过征求意见和创新价格听证方式，不过，降价可“适用于简易程序”。

去年的降价是“扎堆”出现的。去年8月底，全国共有21个省份出台了

157个景区降价，到9月中下旬，赶在“十一”前，各省密集宣布景区降价，合计降价数达到981个。统计数据显示，如果不考虑发达区域门票基数相对较低的可能性，出现了越依赖旅游的次发达地区票价降幅越大的倾向。云南降幅三成，新疆地区定价在150元/人次以上的景区门票综合降价幅度达30%；黑龙江五大连池降价32%。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千岛湖、普陀山的门票只分别下降了10%和13%。

“门票涨价要召开价格听证会，降价是否可以避免一刀切呢？”张家界副总裁金鑫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融系副教授贺俊说，尽管景区是特殊商品，但不能为了结果的公平，忽视了程序的正当性。

票价构成“变不变”

“不是不让景区公司赚钱。”一位不愿具名的某省发改委人士坦言压力很大：知名景区降得太少，如何给社会“交代”？他认为，涉及到社会资本参与的国有控股景区，政府进行门票降价听证合理但操作有难度：“运营成本也许好核定，但对参与票价分配的各方来说，到底多少回报叫合理？”

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部分景区降价的幅度和范围，主要受省市政府相关部门决策；另一方面，降价本身也影响区（县）等地方政府财政，但整个票价的构成又相当复杂。

资料显示，2017年国家发改委曾对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进行过摸底调研：当时180元的门票中，市、区、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三级单位共提取36.5元的“资源有偿使用费”和51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真正用于景区的“运营维护成本”仅71元，占比不到40%，由市、区管委会等14家单位参与门票分成。

因此，国家发改委在降价文件中直指了“降价难点”：从深层次看，一些地方仍过于依赖门票经济，部分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额外负担”过重，推高了价格水平，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回溯丽江旅游案例，目前最有争议的环保资金来自于2013年玉龙雪山索道从150元上调到180元时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提价后当该索道票销售收入超过一定基数时，丽江市财政局将按13.89%的固定比例提取环保资金。2017年年报中，丽江旅游营收6.87亿元，盈利共2.04亿元，公司向玉龙县捐赠917.3万元、提取了环保资金7003.76万元用于地方环境保护事业。目前大索

道已降到120元/人，接下来该如何处理？

此前峨眉山A曾公告，每年从景区门票总收入中按照8%的比例提取“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作为峨眉山旅游风景资源保护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

黄山旅游的情况不尽相同。根据披露，目前每张黄山风景区的门票中明确含有“遗产保护费”29元，向风景区管理机构上交门票专营权使用费（门票收入减营业税及附加和票房成本后净额的50%），山上索道等其他业务还有“开发维护费”等，归属于上市公司的门票收入列示在公司年报“园林开发收入”栏中。

也就是说，若门票降价而遗产保护等费用不变，上市公司从景区门票中获得的营业收入和利润降幅将比门票价格降幅更大。国盛证券研究所根据2017年的数据计算，黄山风景区降价前门票共收入5.48亿元，其中上市公司收到2.4亿元，占比约43.7%，管委会获得超过55%。

“可以把黄山门票里29元/张的‘遗产保护费’理解为资源保护费，这是2014年安徽省人大出台《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时定下的，计算方式是按照230元/人票价的10%，加上之前早年间留下的6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有接近安徽省物价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黄山旅游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无法预估黄山风景区门票降价后，门票中相关费用能不能同比例减少。

“老政策”能否解决新问题

黄山风景区难以处理“遗产保护费”增减的原因之一，是制度上有“空白”地带。2018年初，黄山市政府开始实施《〈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办法》，其中提到“管委会应当依法征收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黄山风景区内经营者应当缴纳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具体征收范围、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而且，门票收入中的资源保护费和对景区内经营企业收取的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等将共同组成“生态补偿金”，生态补偿金的管理和使用，由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商黄山区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但目前黄山市政府层面的新意见还没出台。

“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遗产保护费”、“资源保护费”、

“生态补偿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这么多概念，就已经让投资者搞不清状况，遑论每种费用的具体征收范围、标准。

在业内看来，收费体制不清，部分也源于管理体制和相关法规的不畅，“老办法”和“老制度”解决不了新问题。张旅集团纪委书记杨流爱就曾表示，张家界核心景区保护开发的总体规划已制定了多年，并未更新，近期公司想做一下产业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但在具体筹备的过程中，“规划部门的手续就是办不下来”。

张家界副总裁金鑫则在为业绩发愁。“景区内的公路是我们在修，游客中心排队的栅栏也归我们负责，但本身这些都不计入公司的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更多应该是政府责任，甚至是公益事业。国企本来已经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降价只降国企，我们和民营旅游企业之间竞争如何能公平？”金鑫说。

“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旅游景区公司都一直是‘戴着镣铐跳舞’。”一位多年跟踪旅游行业的观察者表示，虽然根据国家规定，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与经营者签订合同，依法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但实际来看，景区公司的“责、权、利”如何划分，依然是模糊地带。

上市转型路多艰

降价后的“十一黄金周”数据显示，去年国庆国内旅游增速十年来首次在双位数以下。峨眉山风景区共接待游客14.3万人同比微降，黄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8.96万人增长10.38%，但对应门票收入3061万元下降了11%。九华山共接待28.2万人下降8.2%，门票收入下降15.2%。

上述数据佐证了传统景区吸引力在减弱，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大河涨水小河满”，歙县阳产景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黄山等知名景区降价，带动了周边小景区休闲旅游的客流。

“不降、缓降都不是办法。”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副总裁贺燕青认为，景区的公益性和全域旅游的趋势是国内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降价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倒逼传统景区的转型。

各传统景区公司也在积极调整。目前，黄山旅游一方面积极推动重组宏村，提升花山谜窟等皖南优质景区，借力杭黄高铁通车深化加强和浙江联系；另一方面，推动黄山风景区扩容和内部酒店、索道、餐饮等的内部挖

潜。张家界此前拟发行可转债，募资投向相对休闲的“大庸古城”项目。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造成短期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矛盾，本质根源在于目前我国景区发展的不成熟和不完善。也有业内人士在调研中提出：当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减免景区相关票价时，可以适当给与参与的社会资本一些减税、补贴或其他政策支持。

比如说，藏旅2017年受西藏自治区政府出台“冬游西藏”政策的影响，出现公司营业收入增加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同比大幅减少的情况。不过，截至目前，西藏旅游还尚未公告2017年相关补贴资金的到位情况。近期西藏推出国有3A级（含3A级）以上景区冬季免费游览，对西藏旅游等民营控股公司运营的景区已不再做免票要求。

旅游这个被视为“诗和远方结合”的大产业，虽然被券商多次唱响“国企改革红利”，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巨头型的“大公司”。近年来更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介入自然景区开发的民营资本，主动调低了IPO上市的期望，有的更放弃申请“5A级景区”等以避免出现政府指导价；而国资控股的景区企业，依然被地方政府寄托着上市的期望，井冈山、普陀旅游等仍有IPO打算。

“这些年，不少其他景区公司来交流，感觉多数公司离上市还很远，主要都是独立性不够、政企难分的问题。”一家国企旅游上市公司董秘说，“假设景区门票降得太多，地方政府和风景区管理机构收入大减，会不会转移压力给景区内的企业？”

专家视角 景区降价推动行业改革：“一令即行”难在何处

风暴眼往往最为平静。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一场旅游行业高端论坛上，主办方在最后的讨论环节设置了一道题目：“如何应对景区门票降价的压力？”没有一位嘉宾选择就这个话题公开发言。

绕过话题并非因为“不想谈”，而是降价带来的连锁反应和背后的系列难题，需要去慢慢厘清，而各方观点亦有不同。记者近日采访了四位专家，就景区门票的“降价之痛”和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发表看法。

高舜礼：景区降价未必能一令即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资深旅游行业专家高舜礼认为，对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实行降价有着积极的意义。之所以降价难，主要有

三个原因：一是认识问题，二是景区有负担，三是时间相对较紧。国有景区该不该降价？这不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应由国有资产的所有方来决定。

高舜礼说，如同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整合一样，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认识问题，也必然会涉及中央与地方、部门与地方以及多方面的利益调整，但还是要向前推进，因为对国企改革有决定权的是其所有者，而不是具体国企本身，暂时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应该理解。

高舜礼说，降价多少才合适，最好应该有一套统一的算法，也就是所谓要“形成门票定价的透明机制”。应该有相应机构去督促落实，才不至于拍脑袋或讨价还价。

魏小安：培育健康的成长环境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原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魏小安则不赞成景区大降价的趋势。他认为，景区如果免费，会让一流的景区资源变成最差的产品；大幅降价会失去投资和维护的积极性。中国旅游四十年，现在已经到了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质量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当下中国旅游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大短板，在于缺少健康的企业。

魏小安认为，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业素质和企业发展方面，培育健康的成长环境，引导健康的市场竞争，形成“顶天立地”和“铺天盖地”相结合的产业格局。企业是行业的根基。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不要认为上市旅游公司是地方国企的下属公司。

何建民：正确界定市场和公共部分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旅游管理博导何建民认为，国内旅游业既是产业又是事业，具有双重属性，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各地发展程度不同，各地政府对景区降价的范围和幅度要求的力度不同可以理解。如果景区投入资源全部是国有的，政府代表国家要求降价合情合理。

但目前的问题，涉及到景区是“部分利用了公共资源”，核心是要正确界定市场部分和公共部分的关系。如果完全公共性的资源，应该实行国家公园制度，实行全额财政拨款。目前的情况：尽管国有景区的自然资源都是公共的，但相关配套设施等是由当地政府或者相关企业投资，实际上是PPP模式，景区本身并非是完全公共性的产品。

另外，我国著名的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景区，如黄山、九寨沟，大多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实质是发展扶贫产业。如果降价在执行中没有好好进行成本核算的话，也会带来严重问题。

贺燕青：理顺景区的管理、执行力和激励的关系

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副总裁、社会服务行业首席分析师贺燕青说，虽没有统一降索道价格或摆渡车价格的政策出台，但后续门票继续降价和景区内交通降价的预期比较确定，部分上市公司超预期降价，一方面体现主管部门对于政策预期的判断和积极应对，对国家要求尽快实现旅游景区公益性目标的践行。另一方面，随着全域旅游的推进，政府层面也希望通过景区大力度降价吸引游客，有利于打造全域旅游新形象，提升地区整体竞争力。

贺燕青认为，从长期来看，景区的公益性和全域旅游的趋势是国内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倒逼传统景区转型。对于目前部分“门票经济”依赖较重的景区来说，生存可能逐渐困难，但对管理机制灵活、创新和内容服务能力充足的景区来说，则是很大的机会。由专业团队来运营，是眼前相对可行的道路。如何理顺景区的管理、执行力和激励的关系，将是短期内景区转型的相对重要的问题。

（记者：童璐、林淼）

玻璃栈道亟需纳入国家监管范畴

【法制日报2019年1月18】这样的地方你敢走吗？一条宽2米、长95米的玻璃栈道，围绕着山体蜿蜒而建，一侧是陡峭的山壁，一侧是深谷。靠着玻璃栈道的外沿栏杆往下看，瞬间就有一种眩晕的感觉。这条玻璃栈道，高峰时有6万人次经过。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自2009年10月出现第一条玻璃栈道以来，我国目前至少已经建成了62条玻璃栈道。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玻璃栈道由于高悬于空中，在给游客带来刺激感觉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那么，玻璃栈道到底是景区的一个旅游项目，还是景区必要的基础设施？到底应该由哪个政府部门监管？

各地纷纷建造玻璃栈道 虽然刺激但有安全隐患

今年元旦前的一天，记者乘车赶到华北某地一家景区，这里有一条闻名全国的玻璃栈道。

记者以游客身份一边买票，一边咨询：“这么冷的天，玻璃栈道还能上吗？”

“玻璃栈道关闭，不开放。”售票员说，“已经关闭几个月了，一直没有接到开放的通知。”

记者与两三名游客买票进入景区。乘坐索道到达山顶后，沿蜿蜒山路，朝着玻璃栈道走去。

根据公开资料，这条玻璃栈道开放于2014年9月，用3.2厘米厚的双层夹胶玻璃与不锈钢龙骨架结合建成。

在距离玻璃栈道大约200米远的地方，记者看到石壁旁存放了两块布满裂纹的双层玻璃。据了解情况的人士说，因为经常有落石砸坏玻璃栈道，所以栈道上的玻璃需要及时更换。

景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玻璃栈道的客流量很大，尤其是在五一、十一假期，最多时有6万人次走过。

在玻璃栈道入口处，栅栏敞开，并没有工作人员看管并禁止游客进入，不像售票处工作人员所说的“栈道关闭”。

记者随后踏上玻璃栈道，山风吹过，再加上玻璃栈道滑溜溜的，走路感觉摇摇晃晃。

正往前走，突然听到前方传来“砰”的一声响，记者赶紧抓住栈道外沿的栏杆，待站稳后又挪向靠近山体的一面，贴着光滑锃亮的石壁站好。

待一切归于正常，记者贴着石壁挪到声音传来的地方。原来一名游客不慎将玻璃保温杯摔在玻璃栈道上。由于天气太冷，满地的碎玻璃碴子在短短几分钟内已经被冻在地上，洒出的水也很快冻成了冰。意外发生后，几名游客开始撤往栈道入口。

记者继续走完剩下的玻璃栈道，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游客，只在返回入口时遇到一对情侣。记者告诉他们前方有碎玻璃碴子，他们一听，转身和记者一同往回走，并称以后不想再走这种危险的地方了。

玻璃栈道的危险可谓人所共知，但玻璃栈道却在许多地方都存在。

《法制日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共有20个省份建有62条玻璃栈道，其中江西省最多，有10条；浙江省次之，有8条；河南省居第三，有5条。

玻璃栈道属高风险项目 尚无专门部门负责监管

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国内最早建成的一条玻璃栈道是江西抚州大决山“太空步廊”玻璃栈道，时间是2009年10月。“太空步廊”玻璃栈道建造长度100米，采用全透明古栈道形式，在峭壁上悬空通过。

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体验效果，受到游客的广泛关注和追捧，全国各地的玻璃栈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2012年，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国家森林公园大风堡玻璃廊桥开放，号称当时亚洲第一大悬挑玻璃桥。

2014年，河北白石山开放了国内海拔最高的玻璃栈道。

同年，湖南石牛寨开放了中国第一个玻璃悬桥，随后又开放了首个音乐玻璃栈道。

2015年，北京市平谷区天云山景区的玻璃栈道开放，号称是全国最长的玻璃栈道。

《法制日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统计发现，2015年全国有9条玻璃栈道开放，2016年是17条，2017年达到21条，2018年有8条。

在总计62条玻璃栈道中，除了江西、浙江、河南之外，重庆和福建各分布4条，湖南、湖北、云南、四川、河北和广东各3条。

玻璃栈道直接带来了游客数量。数据显示，北京市平谷区京东石林峡景区建成415平方米玻璃观景台后，游客量从过去的每年不到10万人，增加到每年70万人。

随着玻璃栈道数量的增长，相关安全隐患也时有发生。

2015年10月，河南某景区的玻璃栈道其中一块玻璃被游客的不锈钢水杯砸坏，图片显示，整块玻璃呈爆炸性裂纹。

2016年9月13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栈道上，游客被悬崖上方滚下来的大石头砸中右脚，顿时血流如注。

那么，该如何看待玻璃栈道呢？这是必要的旅游设施还是旅游项目？

对此，北京市法学会旅游法学研究会会长杨富斌在接受《法制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玻璃栈道可以看成是旅游景区开设的旅游项目，用以吸引游客。在实践中，玻璃栈道也多是单独收费，不包括在景区门票之中。因此，具有高风险的玻璃栈道，应该被纳入旅游项目的监管范畴，由相关部门负责监管。

“原则上，谁审批谁监管。就旅游行业来讲，市场监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文化旅游部门都可以进行监管。”杨富斌说，尴尬的是，出于规避监管的考虑，针对这种新的旅游业态，相关部门可能都不愿意监管。

在中国科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主任助理齐晓波看来，玻璃栈道并非必要的旅游设施，因为有木栈道、索桥等相关设施可以替代。

“一般来说，栈道项目的报批立项是和景区规划融合在一起的，按照景区的建设规划等相关流程通过规划评审，通过项目所在地区县或城市规划委员会，并报发改委立项。”齐晓波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玻璃栈道目前没有专门的审批机构，其监管也存在一定的缺失，没有专门负责的部门，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标准。”齐晓波说。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郑向敏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玻璃栈道的监管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玻璃栈道同时承载交通功能和特种设备功能，暂时没有一个专门部门进行监管，但玻璃栈道毕竟属于高风险旅游产品，亟需纳入监管范畴。

明确主管部门监管职责 及时制定建设标准规范

2017年2月，北京市旅游发展委主任宋宇在全市旅游行业安全工作大会上表示，将协同北京市安委会研究商讨确定景区内此类玻璃建筑的监管主体责任。在相关管理措施出台前，景区禁止建设玻璃栈道；已经建有玻璃栈道这类项目的景区，要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强化旅游安全保障，包括强化对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玻璃栈道等设施设备等重点领域及环节的监管。

2018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在其官网发布文章《慎重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其中提到：“玻璃栈道等一大批充满刺激和挑战的高风险旅游项目越来越受到广大游客、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喜爱。高刺激伴随着高风险……为此，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游客要安全为先、量力而行，慎重选择高风险旅

游项目。”

2018年8月1日，河北省住建厅会同省质监局、省旅发委、省安监局组织编制的《景区人行玻璃悬索桥与玻璃栈道技术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对景区人行玻璃悬索桥与玻璃栈道建设材料、设计、施工、验收、检测与评定以及运营安全管理等均提出了明确标准规范。

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规范景区人行玻璃悬索桥与玻璃栈道建设与管理的技术标准。

在杨富斌看来，将玻璃栈道纳入国家监管范畴并出台相关规范，毋庸置疑。因为涉及多个部门监管职责，可以由国务院规范，也可以由住建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应急部门、文化旅游部门联合进行规范，但需要明确一个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

“对于这种新的旅游业态，比如明确由文化旅游部门管理，文化旅游部门就要履行监管职责，如果不明确，文化旅游部门想管也管不了。”杨富斌说，如果国家层面制定规范条件不成熟的话，各个地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地方法规、规章进行规范。

郑向敏的建议是，首先应该由国务院明确玻璃栈道归属哪个部门负责监管，如果国务院没有明确，应该由相关部门合力出台相应规范，联合对玻璃栈道的建筑标准、安全管理等进行监管。

“玻璃栈道和索道等一样具备观光、体验、交通的性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所以，玻璃栈道应该像索道一样接受标准规范、检查验收和安全管理。”郑向敏说。

齐晓波同样认为，玻璃栈道的规范迫在眉睫，亟需引起国家相关部门、有关地方的重视。

“玻璃栈道的规范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除了文旅部门之外，应该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就报批立项、建设施工标准、土地使用、监管运营等方面共同予以明确要求和标准。”齐晓波说，“相关管理规范可以借鉴我国主题公园的管理办法。”

2018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印发并实施《关于规范主题公园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以规范主题公园的建设发展，特别是规范主题公园建设发展中出现

的概念不清、盲目建设、模仿抄袭、低水平重复等问题。

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认为，玻璃栈道作为新兴旅游业态，建设与规范仍需要一段时间，但从目前来看，不管是行业主管部门，还是各地都已经开始重视和关注，相信玻璃栈道能够很快“有序安全合规”。

（记者：陈磊 通讯员：赵婕）

新闻摘要

青海湖景区禁止游客进入核心区

【西海都市报2019年1月30日】冬季，在青海湖畔，徒步和拍摄大天鹅游客的身影络绎不绝。1月28日，青海湖景区保护管理局再发通告，禁止游客在青海湖海心山徒步、泉湾湿地等拍摄以及观光行为。

在青海湖景区组织冬季冰面徒步活动的户外群体，应提交活动组织实施方案和专业保障应急救援方案，经青海湖景区管理局审核备案后方可开展活动。海心山作为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严禁任何户外群体和个人组织开展以穿越海心山为卖点进行徒步等旅游活动。

今年，青海湖景区对“无人机”禁飞区域和越野车进入的区域也有了明确划分。景区禁止任何群体和个人组织在野生动物分布区和鸟类栖息地使用无人机拍摄等干扰和破坏青海湖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

无人机禁飞区域为鸟岛、泉湾湿地、尕斯库勒湖、黑马河湿地、倒淌河湿地、洱海、甘子河湿地、仙女湾湿地等水鸟栖息地和甘子河、哈尔盖普氏原羚分布区。其中，泉湾是青海湖冬季天鹅的核心保护地，每年也吸引着大批摄影爱好者，今年起，泉湾湿地禁止摄影爱好者和游客擅自进入。

此外，鸟岛、沙岛保护区仍处于封闭整治阶段，禁止游客利用冰面和通道擅自进入。景区还禁止组织越野车辆在尕斯库勒湖、金沙湾等沙漠区域开展沙地越野和冰上穿越等破坏沙地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

（记者：吴梦婷）

海南设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新华网2019年1月30日】记者28日从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记者会获悉，海南即日起设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主体位于海南岛中部山区，东起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西至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自保亭县毛感乡，北至黎母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400余平方公里，约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七分之一。至2020年结束试点后，将正式设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海南省林业局局长夏斐表示，此次范围划定立足保护和修复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充分考虑海南长臂猿等重要物种保护和繁衍需要，将海南中部现有自然保护地及周边天然林、公益林区连通起来，统筹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周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划定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

据了解，2019年1月23日，中央深改委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试点将对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实现自然资源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世代传承。

（记者：刘诗豪、刘邓）

社会纵横

景点跨界开发文创如何把控安全关

【解放日报2019年1月14日】近日，“故宫淘宝”官方微博发帖称，故宫淘宝原创系列彩妆从外观到内质仍有很多进步空间，决定全线停产。这离该系列彩妆正式推出不到一个月。在上海，不少景区正在尝试跳出胶带、钥匙扣、冰箱贴等领域，开发更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景区想要踏入尚不熟悉的领域，怎样才能不“翻车”？

文创跨界没那么简单

不到一个月就“翻车”，是因为故宫文创的步子确实跨得太大。“故宫淘宝”微博表示，经过网友反馈，口红外观“不够高级”，膏体不顺滑，眼影“飞粉”，实用度欠佳，他们打算进行改良。

景区开发化妆品，品质还在次位，更重要的是对化妆品安全的把控。“故宫这次开发彩妆存在专业性问题。”原上海博物馆教育部主任郭青生认为，对于食品、化妆品、药品等可能会影响人体健康的物品，景区在开发时更要慎重，确认安全后才能上架。

郭青生曾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多年，他说，国内博物馆、景区开发的文创产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早，博物馆中只有馆内藏品的仿制品，如仿制青铜器等。之后，这些仿制的藏品被增加一些实用功能，比如将仿制青铜器做成容器。如今，文创产品需要经过精心设计，将古代元素与现代物品完美结合。在这类文创产品开发中，故宫走在了国内景区的前列。

近年来，故宫推出一系列文化创意产品，截至去年12月共研发11936件，年收入超过10亿元。经过精心设计的故宫日历、宫廷饰品、故宫胶带等都颇受欢迎。故宫博物院的基础是明清的宫廷文化。不过，从故宫彩妆系列的暂时停产也可看出，文创产品想要踏入更专业的领域，需要专业技术支撑，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摆脱“一个图案走天下”

在上海景点的纪念品商店中，也不乏一些新探索。上海新天地就和多名设计师合作，开发一系列和石库门、旧上海相关的小音响、餐具、饰品等，并在新天地北里开了一家概念店。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底楼的广场上，记者看到不少游客手中拿着东方明珠塔造型的蓝色矿泉水瓶，喝完水也不舍得扔，“打扫卫生的阿姨说，现在一个空瓶也捡不到，大家都当作旅游纪念品带回家了。”东方明珠塔副总经理沈炯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东方明珠塔一直在延伸旅游纪念品的种类，相关衍生品已占总收入10%以上。

不过记者也发现，上海不少景区的文创产品仍集中在文具、马克杯、笔记本、钥匙扣上，有些文创产品“一个图案走天下”，同一张图印在不同产品上，很难激起游客的购买欲。

在采访中，不少专家认为，目前景区开发文创产品亟须理念创新。“现在景区文创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严重。”郭青生说。景区扎堆做书

签、胶带和钥匙扣，是因为这些文创产品功能较简单，对质量没有太多要求。但由于相关市场趋于饱和，已失去吸引力。

文创产品还可以往哪些方面发展？在郭青生看来，文创产品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创意是无限的”。近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就和文物仿制品制造公司合作，设计了不少具有实用性的文创产品。其中仿古门锁系列就广受好评，门锁外观是古代式样，但内里却是现代弹簧锁，在保留历史文化元素的同时，也具备更高的实用性。如今，受到游客认可的优秀文创产品需要在传统和现代、装饰性和实用性之间寻求平衡。想要打造“爆款”，除了在形式上突破，更需要考虑加强核心功能。

可尝试和专业品牌合作

除了景区之外，一些专业品牌也开始在产品中融入上海的文化特色和著名地标，在旅游纪念品市场分一杯羹。近日，记者在南京路步行街发现，路口的乐高商店就为游客添加了不少旅游元素。店内最漂亮的一面墙上，用乐高积木搭出南京路的繁华景象，还保留一个个霓虹招牌。此外，在商店内逛逛，一套涵盖东方明珠塔、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等建筑的“上海天际线”积木产品吸引眼球。在上海豫园、东方明珠塔、思南公馆等景区的星巴克内，一套印有上海景点的马克杯也有很高的人气，网上有不少“代购”。

事实上，在故宫彩妆宣布停产时，就有网友建议，故宫可以和一些优秀国产彩妆品牌合作，联名推出品质更高的产品。既然品牌具备成熟的技术和产品，景区是否能进行实践创新，和类似品牌进行合作？

“国外已有类似的尝试，国内景区完全可借鉴。”上海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孙雪飞说。据介绍，这种和品牌合作开发文创产品的形式在国外知名大学很多。国内游客爱“打卡”的牛津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知名学府的纪念品商店中，常摆满各种印有学校元素的手表、服装、围巾等。这些纪念品通常是学校与多个知名运动和文具品牌合作的产物，受到学生和游客的欢迎。

此外，景区可以和品牌联手尝试“快闪店”，在景区中以快闪的形式推出各类文创产品，每过一段时间更换，保持新鲜感。景区还可以通过活动吸引客流，借此提高自身影响力。

不过，孙雪飞也指出，景区在和品牌合作时，要提高选择的门槛，注重独特性和匹配度，不是一味放开授权。“景区文创开发团队需要将景区看成

一个有温度、有独特气质的‘生命’。景区内摆放的文创产品和景区气质相符，才能真正成为景区特有的文化特色。”

（记者：裘雯涵）

时事评论

用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公园建设

【人民网2019年1月23日】国家公园是政府供给的新型公共产品，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亮丽名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等相关文件的相继出台，我国已基本完成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步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国家公园作为一类特殊的自然保护地，本质特征在于其鲜明的“国家”属性，公有、共管、公益、公享是题中之义，国家主导、公益优先和保护为主是目标诉求。这就决定国家公园不仅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自然资源保护方式，也将带来自然资源保护理念、配置模式和管理体制的全面革新。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通过专门立法系统规定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权责体系、机构设置等基础制度，为国家公园建设与运行扬起法律之帆。

目前，我国已设立10个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但统一的国家公园立法迟迟未能出台，仅有部分试点地区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地方性法规。比如，湖北省人大常委会2017年通过的《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福建省人大常委会2017年通过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试行）》，青海省人大常委会2017年通过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等。这些法规对地方改革探索起到了很大的规范和促进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上位法作为依据，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让国家公园更好承载“国家”属性，需要解决各地分散立法的问题。比如，地方性法规的法律位阶偏低，无法就国家公园的遴选标准、管理体制、

资金保障、事权配置等形成全国统一标准；实现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与我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其他自然保护地的既有法律相衔接，也是地方性法规难以实现的任务；国家公园要保持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往往是跨行政区域的，但地方性法规只针对本辖区内，也就难以契合国家公园管理突破行政区域界限、消除行政壁垒的制度需求。因此，没有国家层面的立法进行统筹和规范，地方改革实践走到一定阶段就可能遇到瓶颈。

这样一部全国性法律又该具备哪些要点？首先，应当做好法律之间的协调、衔接工作，避免国家公园在管理对象上与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出现交叉重叠。其次，需要明确国家公园中自然资源权利的行使机制，明晰中央和地方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事项上的事权分配。再次，明确统一专门的管理机构及其职权职责，以解决当前国家公园中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分散、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最后，还应形成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包括国家公园管理计划与审查制度、自然资源保护制度、多主体权利协调与冲突解决制度、资金保障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以及经营规范制度等。

制定一部统一的国家公园法律，十分必要。只有从现在起加快立法进程，才能为“到2020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基本完成，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国家公园总体布局初步形成”的目标提供保障，推动国家公园建设驶入快车道。

（刘超）

世界遗产

修复吴哥：一场跨越26年的30国抢救行动（上）

【腾讯网2019年1月22日】1861年1月的一天，在暹粒的热带森林中，一座恢弘的古城，浮现在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面前。它就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吴哥窟。

实际上，吴哥窟只是吴哥古迹的一小部分。后者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

落，包括巴戎寺、女王宫、巴方寺、塔布隆寺等六十多处古建。它们是高棉帝国的遗址，始建于9世纪初，在14世纪被遗弃。

同一年，穆奥在热带雨林中病亡。他的游记后来被整理成书，书中这样形容吴哥：“这里有些寺庙可以和我们的所罗门比对，美得像是古老的米开朗基罗所建，大可以和我们自以为最美的建筑平起平坐。”因为他的书，吴哥在西方世界声名大噪。

在柬埔寨成为法国殖民地后，吴哥古迹的修复与保护，由法国远东学院（EFEO）操刀进行。吴哥古迹考古公园成立，女王宫、塔布隆寺、豆蔻寺、巴方寺被逐渐修复。可以说，正是因为法国远东学院，吴哥古迹的科学研究和保护工作得以开启。

但吴哥古迹命途多舛。1970年，柬埔寨内战爆发，修复工作被迫中止。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33位柬埔寨修复专家被害，重要的修复资料被焚，吴哥古迹杂草横生，一些被修复的建筑再遭破坏。

1992年成为吴哥古迹命运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濒危遗产的形式，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次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保护和开发吴哥遗址国际协调委员会（ICC-Angkor，以下简称ICC）成立。来自柬埔寨、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37个组织代表与会，国际社会开始联手保护吴哥古迹。

参与吴哥保护的，先后有三十多个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十多年间，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建的中国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先后修复了周萨神庙和茶胶寺。在《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造访吴哥七百多年后，以这种奇妙的方式，中国与吴哥再续因缘。

颇为有趣的是，对于应如何修复吴哥古迹，不同国家往往持不同的理念，甚至因此出现争论：有些国家用新材料对本体进行补充，有些国家则认为这样会破坏遗产的真实性；再比如，有些国家选择对遗址进行加固，有些国家则选择解体再重建的“解体式修复”……在某种意义上，历时多年的吴哥修复，既是一场多国合力的抢救运动，也是一场它们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PK。

在此期间，坍塌的建筑重新矗立，散落的石块复位，吴哥摘掉了“濒危”的帽子。有人感慨：“吴哥得救了！”而多位为吴哥保护殚精竭虑的修

复专家，则为此奉献了半生。

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启动26年来，到这里参观的游客，从寥寥无几到熙熙攘攘。2018年，吴哥接待了194个国家的259万人次游客，其中中国游客占比四成多，中国已经是吴哥游客最大的来源地。

吴哥古迹如何从废墟中重生，又是如何成为全世界共同保护文化遗产的典范？围绕这一话题，作者对参与吴哥古迹修复的法国、日本、瑞士和中国专家进行了采访，了解26年来，多国合力保护吴哥的故事。

拯救吴哥

81岁的日本考古学家石泽良昭告诉作者，自己永远不会忘记，23岁时第一眼见到吴哥窟时的情景。

这是吴哥古迹中保存得最完整的建筑，被一条护城河围绕。它是一座须弥山金字坛，5座宝塔在寺庙的顶部凌空而起，最高的一座宝塔高达65米。

当时吴哥窟还没有成为柬埔寨的文化名片。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庙宇，正被夕阳所笼罩，美得惊心动魄。石泽良昭被这一幕深深震撼。

“这一大片建筑诞生于八百多年前。我不禁好奇，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创造出这个奇迹的。”石泽良昭说。为了找到答案，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吴哥古迹保护中。1961年，他进入吴哥古迹保护办公室，开始研究碑文，并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柬埔寨朋友Pich Keo。

当时柬埔寨刚从法国治下独立8年，参与吴哥古迹修复的，仍然主要是法国远东学院的专家。他们开始修复巴方寺和有“翻搅乳海”浮雕的小吴哥东南画廊等处。因为觉得巴方寺结构不稳，专家将其拆解为30万块石头，编好了号，计划重建。

不幸的是，1970年，柬埔寨内战爆发，交战前线推进到暹粒和吴哥古迹公园之间。面对形势严峻，所有外国专家不得不撤离柬埔寨，石泽良昭也与Pich Keo失联。

巴方寺的30万块石头，就此散落在周围的树林里。

在此期间，吴哥保护工作遭遇浩劫：1975年，红色高棉的支持者进入金边，将法国远东学院存放在那里的重要资料付之一炬。记录巴方寺每块石头位置的资料，也在里面。

更让人悲痛的是，在大屠杀中，33位帮法国远东学院修复吴哥古迹的柬

埔寨专家，不幸遇难。一些原本已被修复的古迹，又逐渐破败。

1980年8月，柬埔寨内战最激烈的时刻，时任日本鹿儿岛大学教授的石泽良昭再赴柬埔寨，对吴哥古迹进行调查。当时那里处于波尔布特和韩桑林的交战地附近，他既要担心人身安全，也要思考如何将吴哥古迹从战乱中救出。

在这次调查中，石泽良昭发现，破坏吴哥古迹的三大元凶，分别是雨水、植物和苔藓。它们直接导致了遗迹的倒塌。“无法说出自己痛楚的巨大遗迹群，是不是也在期待着被世人发现的那一刻呢？”石泽良昭在书中这样写道。

在红色高棉失势、局势稍稳后，1980年代中期，柬埔寨向全世界求援，希望有国家帮助修复吴哥古迹。但当时，只有印度响应。原因之一，是吴哥古迹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

印度修复的第一个项目是吴哥窟，从1986年开始，为时6年。

然而，印度队的修复方式令人担忧。《纽约时报杂志》曾这样描述吴哥窟被印度队修复的场景：“在印度人的指挥下，成百名没有古迹修复经验的柬埔寨劳力，用硬刷子和一桶桶氨水，使劲擦洗那些精美的石雕，仿佛在擦洗厨房的脏地板。”

印度专家称，这种修复方式可以根除正在吞噬古迹的植物。质疑者则认为，化学清洗剂会腐蚀古迹表面，他们是在“打扫卫生”，而非“保护古迹”。在清洗之后，吴哥窟的砂岩石露出了原色，变得明亮，却因此丧失了岁月带来的沧桑感。对此，文物保护界和柬埔寨政府都不满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1986年，已经成为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总监的Pich Keo，向时任日本上智大学亚洲文化学系主任的石泽良昭，发去了一封求助信。它几经辗转，最终到达石泽良昭手中。

在这封信里，Pich Keo告诉老友吴哥古迹遭遇的坎坷，并表示，自己担心在印度队的修复之下，吴哥古迹遭受进一步的破坏。他希望老友能提供帮助。

收到来信，石泽良昭马上前往吴哥。但柬埔寨内战仍未结束，他很难在当地开展工作。

直到1989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委派下，石泽良昭终以团长身份带领

国际调查队，前往吴哥古迹调查。此后，他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印度在吴哥古迹的修复工作“不合适”“原始而简陋”，请求后者尽快采取措施。

1992年，柬埔寨时局相对稳定，此时，吴哥古迹以濒危身份入遗。次年，关于吴哥保护的政府间会议在东京召开，《东京宣言》成为鼓励各国共同保护吴哥的重要文献。同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下，保护和开发吴哥遗址国际协调委员会（ICC-Angkor）成立，法国和日本担任联合主席。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为参与吴哥古迹保护和修复的各国提供技术建议、指导和评估，但印度一度被排斥在外。

“对于印度队的修复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严厉批评。”一位专家表示。

但尽管最初的修复方式不当，印度队毕竟第一个来到柬埔寨，在缺少资源的情况下修复古迹。印度专家也多次与ICC进行沟通解释。因此，当2002年印度提出塔布隆寺的修复提案，并组建了阵容豪华的专家团“站台”后，柬埔寨政府同意了。

印度之外，日本修复巴戎寺，美国修复巴肯寺和圣剑寺，法国修复癞王台和巴方寺，瑞士修复女王宫，德国修复吴哥的雕刻，意大利修复比粒寺，中国修复周萨神庙和茶胶寺……一场漫长而艰辛的多国修复，开始正式启动。

拼图游戏

1995年，28岁的法国远东学院专家罗耶来到柬埔寨，开始重启巴方寺的修复工作。柬埔寨内战前散落的30万块石头，还在原地安静地等待着他。他经常对着某块石头一盯就是很长时间，仿佛在看无价之宝。

罗耶同事、女建筑师碧欧菲斯特也曾参与巴方寺修复，现在是西梅奔寺修复负责人。她告诉作者，修复巴方寺时，罗耶和一位法国雕塑家，从法国带来了3台起重机、2台提升机，以及锯石头的工具。为了节约经费，其他工具大都来自当地。比如工人们切割石头的工具，就是用工地现场的钢筋打造的。

他们遇到了难题：如何修复巴方寺顶部的寺庙？

11世纪时，真腊国王优陀耶迭多跋摩二世修建了巴方寺，将其作为献给

湿婆神的国庙。15世纪晚期，它被改建成一座佛教寺庙，湿婆神庙的一些建材，被用于修建巴方寺第二层的大卧佛。

那么，应该如何呈现这座寺庙的两段历史？

在整理散落的大石头时，罗耶团队发现，它们在工作坊切割过的，上面有工具切割的痕迹。这些痕迹和在用于修建卧佛的石块上发现的痕迹相同，和11世纪最早建庙时的痕迹完全不同。

最后的选择因此变得自然：按照15世纪晚期时的样子复原。

罗耶团队面临的另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如何把散落在寺庙周围的30万块石头，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

在经历了几百年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后，这些石头有的碎裂，有的没了棱角。这是一场让人望而生畏的复原。

“我们要做个很大的拼图游戏，但是我们缺少对照图。”在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罗耶坦言。

他有三条线索：法国建筑师雅克·杜马西的回忆——他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参与巴方寺修复；保存在巴黎的上千张巴方寺的照片——它们可以表明在被法国远东学院拆解前，寺庙的哪些部分已经倒塌缺损；巴方寺的剩余部分。

修复团队曾借助计算机还原寺庙的样子，但是因为石头破损严重，计算机的作用不大。最后，罗耶团队使用了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凭记忆记住石头的样子，然后进行人工拼凑。

“这并非是什么高科技的项目，主要是你得集中精力，别睡着。”罗耶曾如是说。

在修复周萨神庙时，中国队也面临类似的考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助理馆员黄雯兰告诉作者，当时神庙损坏严重，主体结构已不完整，部分建筑仅剩基座，4000余块石头散落在周围。

中国队开展了大量的前期研究，为石头分类、编号，进行耐心的整理和拼接。最终，队员们摸索出了一套拼构件的技巧与方法，在7年的维修过程中，有3000余块构件回归原位。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开始得以应用。

在修复女王宫和巴戎寺时，瑞士队和日本队都制作了3D模型。它们为修

复过程提供了清晰指导，也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队在修复茶胶寺时，除3D外，还使用了无人机倾斜摄影和传统人工测绘等技术，为这座始建于10世纪的寺庙，建立了完整的数据模型。（未完待续）

（撰文：崔莹 编辑：李文隽）

环球博览

美国政府关门重创国家公园

【国家地理2019年1月18日】美国政府的关门，让国家公园遭受重伤。国家公园的专家警告说，等到政府终于重新开门时，要复原先前的损害将不会像清走垃圾那样简单。

国家公园是美国的公有土地，不过目前它们成了美国的垃圾桶。

这是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因为陷入边界的筑墙经费的僵局而关门了，让国家公园虽然还是开放，但大多都无人照料。自从12月21日政府关门后，许多公园都传出垃圾桶爆满、厕所淤塞和遭到非法入侵等状况。内政部在1月6日宣布将从门票收入里支出垃圾清运、厕所维护及额外的执法所需的费用。

国家公园保育协会（National Parks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NPCA）在响应这项宣告时表示，公园管理处（NPS）还需要110亿美元来处理积压的大量维护工作，他们担忧使用门票收入会瓜分到这些急需的资金。

在超过400个国家公园里只有117个有收费，也就是说有数百座公园得竞争NPCA宣称会不够用的专款。NPS尚未公布每个公园能得到多少经费。

“我从来没有看过联邦政府在国家公园事务上像今天这样鲁莽。”在谈到只以部分员工人力来保持公园开放的决定时，公有土地信托组织（Trust for Public Land）的主席黛安·瑞格斯（Diane Regas）这么说。“这和已经发生的事没关，它关系到的是当没有适当人员配置时，会发生什么事。”

要开门营业吗？

根据NPCA的说法，各个公园的人员配置并不相同，不过约有1万6000名公园管理处的员工在政府关门后就一直在被强迫休假，只留下少数人执行警务和安全事务。

美国政府在2018年一共关门三次，不过去年1月只关了三天，2月则关了不到一天。而这一次到16日为止，政府部分停摆已经25天了。

2019年1月，美国内政部部长莱恩·辛克（Ryan Zinke）在离职前颁布了一份政策文件，内容概述了国家公园在“拨款问题未决”（lapse in appropriations）的期间该如何运作，例如在政府关门而经费被扣留的时期。这么做一部分是为了替国家公园周边的商家提供财力支持，以及从他们身上获得大量来自公园游客的收入。

“我会说这是较偏政治考虑的决定，”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强·贾维斯（Jon Jarvis）说：“政府不想像上次关门期间那样遭受民众强烈的抗议。”

2013年美国政府在关门16天之后，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抗议，失望的国家公园游客用全美各地公园大门紧闭的照片灌爆社群媒体。

对人和野生生物的伤害

但是现在情况是“暴露在污秽物中，将使人体健康遭受很大的风险”，瑞格斯说。

1月2日加州乔舒亚树国家公园（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的露营地因为旱厕容量已满而被迫关闭。NPCA也说在开放区域和道路上都会看到人为垃圾。

瑞格斯说连这个问题的规模有多大，都因缺乏工作人员导致数据稀少。

将垃圾弃置在开放地区，可能会打乱国家公园必须在游客和野生生物之间维持的巧妙平衡。

“在过去数十年间，公园管理处努力想让黑熊族群戒掉人类的食物。”贾维斯说。一旦熊或郊狼（coyotes）等这类动物开始把人类和食物链接起来，动物攻击人类或被安乐死的风险就会上升。

走在国家公园步道之外的地方或在禁止区域内露营也可能造成长久的伤害。

“在沙漠里，有许多物种生活在地底下，所以走到步道之外造成的伤

害可能真的很大。”NPCA加州沙漠与野生生物计划（California desert and wildlife programs）的主任戴维·连夫朗（David Lamfrom）说。

“即使是心怀善意的人，也会因为没有公园管理员可以请教，而对国家公园造成长期的影响，”他说：“这种情况持续越久伤害就愈大。”

人员配置不足的公园对游客也可能很危险。自从政府关门以来国家公园已有三起死亡报告，还有一个受伤的人是被路过的陌生人运送脱险的。

屋漏偏逢连夜雪

国家公园延期的工作项目包含了金额116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例如维修道路和水道等。没有门票收入，公园每天大约损失40万美元。

贾维斯说，当政府重新开门后，公园的员工要负责清理游客留下的脏乱，而这更会推迟已经被延期的各项计划。并且，目前也没有听到会有额外的经费来协助清理工作的消息。

“美国的国家公园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不只是因为它们的景色优美，”贾维斯说：“还因为它们的管理标准非常高。”

瑞格斯和贾维斯两人都认为，为了避免更进一步的伤害，公园应该完全关闭直到政府重新开门为止。

连夫朗则说问题的整体情况有待确认，不过清理的时间表会排得很长。

“有些要花数周或数月才能见到成果，有些可能要花上好几个世代，有些则可能无法挽救了。”

（撰文：Sarah Gibbens 编译：蔡雅铃）

马耳他海边的自然石拱坍塌近两年， 设计师想用钢铁多面体弥补它

【好奇心日报2019年1月4日】距离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旅游地标之一“蓝窗（Azure window）”坍塌已经过去近两年了。2017年3月8日上午，这座海边的天然石灰岩拱门因为风暴吹袭完全塌入海中，当时马耳他总理约瑟夫·马斯喀特（Joseph Muscat）说“这是个悲伤的日子”，这个消息“令人心碎”。

“蓝窗”位于马耳他的第二大岛戈佐岛上。它是第一部《权力的游戏》

的取景地之一，也曾出现在1981年的电影《诸神之战》和2002年的《基督山伯爵》中。

这座石灰岩拱门长期受到海浪冲刷，经过千百年的演变后形成，人们透过它可以看到蓝色的大海和天空，“蓝窗”的名字因此而来。

也正是因为海水侵蚀，它在2017年之前就时有塌石现象出现。不过，那一年的完全塌陷还是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2013年还有报告显示这座石拱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崩塌危险。

上个月中旬，一位俄罗斯建筑师Svetozar Andreev提出了一个名为“马耳他之心”的景观方案。他提议在坍塌处设一个拥有多个闪亮镜面的钢铁多面体，比例和尺寸与坍塌的石灰岩拱门一致。他想要做的是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新的文化旅游坐标，为此还设计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五层螺旋楼梯盘旋而上，另配有灯光表演设施。

这个提案已经被交给了马耳他的管理部门。设计师认为这个景观代表着自然和现代性的融合，“能证明人类精神的坚韧”，能使坍塌的自然景观再次吸引到游客。在计划被公布后，他还把媒体和社交网络上支持他的观点截图贴到了自己的网页上。在当地媒体Maltatoday发起的投票中，表示“喜欢项目，希望以这种方式重建‘蓝窗’”的人占68%，而认为“这是个疯狂的设计，它在毁坏戈佐岛”的人占32%。

支持者的观点跟设计师差不多。一些人认为马耳他会因此多一个文化地标，引起国内外的更多关注；还有人认为镜面设计是很好的主意，能让海和天的景色映在上面。另外，一位叫Justine Mercieca的网友认为，“蓝窗”的坍塌与之前的保护不善与环境变化有关系，所以非常需要这样一个不同材料的物体用来纪念之前的拱形结构，以突出的效果作为保护自然环境的提醒。她认为用照片和书籍来铭记是不够的，而且，当下的方案要比用相同的石灰岩材料重建要好一些。

当然也有觉得这个设计“违和”的声音。在设计网站designboom发出这个项目的内容后，有人在文章下面评论“这看上去太不协调了，是在给这景观抹黑”；也有人为环境担忧，认为展览馆可以考虑，不过也应该建到附近的其他地方去，而不应该让施工和未来更多的游客破坏周围的自然保护区。

曾经的“蓝窗”所在的圣劳伦斯镇的镇长Noel Formosa在得知这个消息

后对当地媒体Newsbook表了态。他说，“我们在考虑有一个新‘蓝窗’之前，应该先采取行动管理周围的设施环境”，他指的是景点附近停车位紧缺等问题。

他表示“这设计不错，不过有几个疑问”。这些疑问分别是“金属结构是否适应自然景观”、“项目会不会对周围的海岸造成破坏”，以及“它会带来不少游客，但是除了价值之外，还有什么长期影响？”

（任思远）

印尼政府投巨资支持开发民宿业

【人民日报2019年1月9日】在2018年举行的印度尼西亚旅游部年度大会上，印尼旅游部长阿里耶夫·叶海亚提出，未来5年，印尼旅游业要向国内外吸引500万亿印尼盾（约合2437亿元人民币）的投资，用于开发新景区、修建民宿，改善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

这一目标体现了印尼打造旅游大国的雄心。成为旅游大国，完善的配套住宿条件必不可少。然而，印尼酒店资源较为短缺。2017年，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第二站来到了印尼邦加岛，大量的车手、观众以及赛事工作人员将当地的酒店迅速抢占一空，如果“下手”不及时，便无处安身。

酒店不够，民宿“来凑”。阿里耶夫·叶海亚强调，要进一步大力支持印尼民宿行业的发展。据初步统计，2018年，印尼旅游部对民宿行业的投资预计达两万亿印尼盾。与此同时，印尼政府也在想方设法满足民宿行业的融资、贷款需求。阿里耶夫·叶海亚表示，经商讨，印尼旅游部已联合印尼央行，开始为民宿从业者提供住房融资贷款，降低融资门槛和贷款利率，分期还款年限最长可达到20年，力求让民宿从业者没有资金的后顾之忧。在中爪哇省首府三宝垄经营民宿的庄鑫浣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正打算将民宿生意扩大到游客更多的日惹去，有了政府提供的优惠贷款，就不用再担心经费问题了。

印尼有近7.5万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和魅力。2018年5月，印尼农村与落后地区发展部与旅游部共同推出开发10万家民宿的计划。印尼政府为该计划拨款60万亿印尼盾，这些资金将被划拨到多个具有旅游开

发潜力的村庄。去年，印尼新开发出两万家民宿。此举将会为这些村庄带来更多的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让更多百姓受益。

此外，印尼政府还非常重视对民宿从业者和政府管理者的培训。目前，印尼政府对民宿业的培训计划已涵盖了全国31.42%的民宿业从业者。

市场对于民宿的需求量大，一方面因为印尼旅游资源开发不到位，酒店紧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相比于千篇一律的酒店，越来越多的游客更愿意选择能充分体验当地文化的民宿。来自雅加达的媿娅拉是一个民宿爱好者，每年都会和家人朋友去印尼各地旅游，而她一般都会选择民宿。“民宿一般都会比宾馆便宜两三倍，而且能认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体验不同文化。这样的旅行才有趣！”

媿娅拉告诉记者，现在印尼民宿行业也在紧跟时代的步伐。2011年她和朋友去茂物旅游，住民宿还只能依靠电话联系中介，而如今在手机平台上就可以预定，手续非常简单。2018年3月正式上线的Home2Home就是一款在印尼非常受欢迎的民宿共享应用程序，一上线就吸引了200万注册用户，从侧面反映了印尼民宿市场的巨大潜力。

（记者：赵益普）

编 辑：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中国风景名胜》编辑部

联系人：张 立 陈 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7号新疆大厦B座11层，100044

电 话：010-88315330 88315324

传 真：010-88315325

微信公众号

网 址：www.china-npa.org

E-mail：china_fjms@163.net

